

刊叢識認本基

理總 識認何如

著陸季黃



版出社刊週團民

丙種叢刊第一種
 基本認識叢刊第一輯之九
 如何認識總理
 黃季陸著

翻印必究

每冊實價國幣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總經售	發行主任	編輯主任	總幹事	副社長	社長	發行者
民團週刊社	蔣卉	亢真化	錢實甫	林中奇	馮璜	民團週刊社

社址廣東西寧鄉塘廣西民團幹部學校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五日初版三千冊

出版總字第七八號

如何認識總理

基本認識叢刊第一輯之九

- 目次
1. 總理的思想與 總理的信徒
 2. 近代三大革命領袖——總理、列寧、甘地
 3. 認識 總理的兩個要點

一 總理的思想與 總理的信徒

在未入本題之先，我首先要提出一個神話似的故事，這故事的意義就可以作我們如何認識 總理的一個借鏡。

在一九二四年，俄國革命領袖列甯逝世了。當時在俄國的民間流行有一種傳說，說列甯之死是假死，並非真的死了。這個傳說的鋪叙是這樣的：

有一天，列寧在吃飯的時候，忽然想到他如果死了以後，他的同志對以後的工作情形，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他很想假死一次，以達到他所理想的目的，於是他馬上請了一位醫生來。醫生來了以後，列寧就這樣對醫生說：「你沒有一個辦法，使我假死？」

「你爲甚麼要假死？」醫生反問列寧。

「你不明白我的痛苦。當我活着的時候，整個黨的責任，建設的責任，都完全堆在我的肩上，當然我應該盡所有的能力來貢獻給黨和國家。但是，如果一旦我死去，我的同志是否能同樣的負起這個責任來，照着我的計劃、我的思想去做？這是我不能放心的事，所以我想假死一次，來看看死後的情形。」列寧很坦白的說出他的意思。

「可以的，我一定能達到你的要求。」醫生答應了列寧。

「但是你要辦得很祕密，除了你以外，祇許我的夫人知道。」列甯是這樣叮囑了醫生以後，醫生使用很巧妙的手術使他假死了。將他的屍體裝入一具玻璃棺內，意思是要使他在棺內，依然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形。裝置好了以後，便將列甯的死訊宣布出來。

這一個死訊，很迅速的傳佈了全國和世界，俄國的人民和列甯的同志，都感到異常悲痛，將這一具玻璃棺從死的地方抬進陵寢。從此，列甯便很安靜的躺在陵寢之中。

但是，經過了若干時候，列甯感到煩厭起來。在某一天晚上，他忽然從棺材裏起來，帶了一張通行證，悄悄的從陵寢的後門出去，跑到克勒穆林——俄國黨政高級人員會議的地方。他拿帽子遮住了自己的面目，躲在屋子的一個角落裡，靜聽那些委員們在那裡議事。結果他認為很滿意，於是仍舊回到陵寢，

在玻璃棺裏躺下來。

第二天晚上，他又起來，走到一間工廠裏去，有幾個工人在做夜工。他同他們談話，問他們的生活情形和意見。工人說：「革命以後，他們已經很享幸福，而且不和從前一樣，一定要做夜工。」列甯得到這樣的答復，於是又很滿意的回到陵寢躺下。

第二天晚上，他再起來，坐着火車到鄉下，去看看農村的情形。和農民談話之後，覺得農民的生活很好，而且農村的一切設施也都能如他生前的一樣去實行。於是他又滿意的回到陵寢躺下。

自從這次以後，列甯就再沒有起來了。這一個神話似的傳說，也便這樣結束下來。不過，俄國的人民和他的同志却絕對的這樣相信：他們的領袖終於是沒有真的死去，他是必然的有再復活的一天。

列寧軀壳的復活，當然不可能；神話也祇是一個神話而已。但是這個神話，却包含着一個深刻的意義。由這個神話，我們可以想到：一個革命主義，在進行當中，如果不幸失掉了他們唯一賢明的領袖，它是很容易受挫折和打擊、以致於中斷的。同時在另一方面，我們却又體驗到：如果是正確的革命思想和正確的革命主義，不管遇到怎樣的艱難困苦，甚至消沉中斷，然而它終於要復活起來的。列寧的同志和信徒，堅守着這一信念，依照列寧生前所昭示的繼續努力，以獲得目前的建設成績。這個，就是顯示着列寧雖死未死，和他依然活着的一樣。

回頭來看看我們國家的情形。自從 總理逝世以後，我們黨的情況如何？總理的思想、理論、方略，是否已經由黨和同志來身體力行？在今天，凡屬總理的信徒，對於這些都是應該深自檢省的、深覺愧汗的。我們可以這樣說：

這幾十年以來，中國和俄國革命後的情形不同，即是孫文主義的信徒與列寧主義的信徒之成就不同。總理逝世後之一二年間，從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中國的革命的潮頭也曾經有一度的高漲；但是這種蓬勃的現象正如浪花一樣，經過一番激盪，湧現出不少的水紋，不久即依然復歸平靜。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中國革命幾乎完全陷於停頓的狀態。此種狀態之發生，完全由於 總理逝世以後， 總理的信徒未能根據 總理的思想與所昭示的方略，來負起建設二民主義的新國家的責任來。如果這種狀態長久這般延續下去，那末，我們的總理就是真的死去了。要知道，我們要挽救中國革命的中斷，我們必須使總理復活起來，而使 總理復活也絕不是如神話所想像的要 總理軀壳能復活，是祇要能恢復 總理的精神，謀 總理的主義之實現。要同列寧的信徒們一樣，對領袖的復活具一個堅決的信念。

通常的情形總是這樣的：在一個領袖活着的時候，大家都會很任意的將所有責任推到領袖一人的肩膀上去，正如中國俗語所說：「大樹底下好遮蔭」。於是養成了一種依賴領袖的心情，不能自己確定自己的責任。迄至領袖一旦不幸死去，革命事業與工作均停頓下來，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其實，革命領袖所負的責任，是有限度的，也可以說祇是一個部分的工作，整個工作的推進，完全要靠革命的同志和革命的羣衆。我們的革命成就爲甚麼會不如俄國，爲甚麼在 總理逝世之後遭遇失敗？事實很明白的擺着，就是我們的同志不能在 總理逝世之後，如列寧的信徒一樣去腳踏實地的努力於 總理主義之實現。

現在，我們應該堅定這一個信仰：凡是正確的革命主義，沒有不復活的；除非他是荒謬的，不合客觀條件的。否則，一定復活。 總理逝世後，中國的

革命遭遇到這樣大的失敗，固然是很不幸，然而也不是甚麼非尋常的現象。本來，有些革命的成功是一往直前的達到目的；有些却經挫折，然後再復活起來，而走入它的成功之路的。如果俄國是前者，我們便是後者。即經過自然的演變、推行、中斷、再回轉頭來，三民主義仍舊成爲建設新中國之最高的原則。不過，這種情形總是很可痛心的事。中國革命的方法變成了一種非科學的方法。總理的精神是科學精神，而 總理的信徒去推行革命工作却是非科學的。自十三年本黨改組到十六年國共分家，再到目前的全面抗戰局面之展開與中國共產黨之回頭，這一段歷史中間，真是極盡悲歡離合之能事。而這一番經過中，無味的代價也就實在償付得太大。例如，十六年清黨之後，文化、經濟等的損失不談，單說人的損失，從容共至分共，至回頭來加入抗戰建國的工作，便已經超過了二千多萬人的犧牲；江西至少八百萬，湖南四百萬，安徽、

河南、四川共達千萬之巨數。我們翻遍中國的歷史，幾曾找得出支付過如此大的代價？然而，這還是從數量上講，如果從質量上計算，更值得令人痛心。這二千多萬人中，一部份是全民族最優秀的份子，就因為對時代的觀察錯誤，思想不正確和對總理不能深刻的認識，而造成這種惡果。我們讀歷史的，對於這一次的教訓，一方面可以明白：凡屬合於客觀條件的主義，必然有復活之理；一方面鑒於這種時間與代價兩不經濟的革命方式，也是應引為切戒的。凡屬總理的信徒，三民主義的信徒，從此應大澈大悟，不僅要認識主義，同時還要去努力於主義的實行。

根據以往的事實，顯然的，除了是不能認識主義的這一問題之外，便是大家不去體驗主義的實踐。這種錯誤的造成之責任，中國共產黨固然不能辭其咎，而中國國民黨尤應担任之。我們要知道：中國的革命已不需要討論何種革

命方式的問題，祇有一個如何實踐三民主義的問題；而如何實踐三民主義之責，亦惟三民主義之信徒乃能負之。以往因主義的不能推行，遂造成革命失敗的結果。至於主義為何會不能推行，則由於本黨的理论與實踐不能統一，信仰三民主義是一回事，而推行三民主義又是一回事，能說不能行，於是主義變成了空談。

根據以往的錯誤，我們認為要糾正它，就惟有深刻去認識 總理的主義，承認三民主義為建設新中國的最高原則；同時健全黨的組織，以共謀三民主義之實現。過去黨的不健全，大半是因為組織的幹部不健全的緣故；不能正確自己的思想，不能明白自己的責任。我們並不是妄自誇大，確實，廣西的同志是與眾不同，不僅在堅決的信仰三民主義，而且在身體力行以實行三民主義。同時，我們更不要妄自菲薄，今後領導整個的中國革命以入於三民主義之大道，

亦惟有像廣西同志這樣的努力，才能勝任此艱鉅。這是我們應當共同勉勵的！如此，則中國革命的前途，中國國民黨的前途，都可使人樂觀，而我們的總理也必然會復活起來！

二 近代三大革命領袖——總理、列寧、甘地

現在，我們要歸結到本題上來了，即是「如何認識 總理」的這一問題。關於謝 總理的如何認識，我以爲最好從事實上去求瞭解，從比較上去求答案。誰也知道，在二十世紀當中，世界上產生了三大革命領袖：第一個是總理，第二個是列寧，第三個是甘地。從他們各個在革命的實行上，看出他們各個不同的方式和主張，我們再將列寧，甘地和 總理來作一個比較，由此便可顯現出 總理的偉大來。

但是，在沒有作這個比較的說明以前，我覺得目前有一個通常的錯誤觀念和兩個治歷史者所犯的一般毛病，必先糾正，才能使我們的說明成爲有力。

所謂一個通常的錯誤觀念是甚麼？即是目前一般國人的「崇洋」觀念。這個看起來雖然是一種小節；然而演變到民族自信力之消失，却不能不承認其爲民族的一個大危機。「一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並不是中國軍隊絕無對外作戰的能力，而是事實上自己的沒有把握。這個原因就是自鴉片戰爭以後，清廷一貫的外交政策——對外恐懼，所造成的必然趨勢。對外國人的觀念，是由憤恨到恐懼，由恐懼到崇奉。譬如現在流行的名詞所謂「摩登」，即是這種崇洋心理的表現。一般人穿洋裝，說洋話還不管他，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智識份子，更爲表現得充分。留學生回國之後，過去口頭上時時刻刻掛着的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現在便是馬克斯。而他們在外國之獲得博士等類的頭銜，却

是拚命的搬運孔子、墨子、莊子、老子的學問。據我個人二十年前在英國哥崙比亞大學圖書館裏所看見的中國博士的論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這一套。因爲中國人不明瞭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馬克斯，外國人不明瞭孔、墨、莊、老，於是他們拿着這些來兩面販賣，兩面欺騙。你想，自命對西洋文化瞭解的人尙且如此，這種現象是如何的可悲！又如蘇俄五年計劃，大家以爲是時髦的了不得，而對於 總理的實業計劃，却說這個名詞太平凡；其實他又何嘗懂得實業計劃的內容？說到實業計劃的創立，誰也知道是在蘇俄第一次五年計劃以前的十多年，足見蘇俄的五年計劃是多半採取 總理的主張。從這些地方，可以證明中國人之瞭解 總理，反而遠不如外國人。這種卑劣的崇洋的錯誤觀念，如果不糾正過來，我們是沒有方法可以認識 總理的。

其次，再說到兩個治歷史的通病。這也是在想認識 總理之前，所必要改

正的。這兩個毛病，中外歷史家都同樣的犯着：一個是「近視病」，一個是完全運用唯物史觀的方法，而忽略了歷史的主觀方面，忽略偉人與時代的關係。

先說「近視病」罷。例如華盛頓，現在美國人都稱之為「國父」，而全世界的人也同樣尊敬他。但是在美國獨立運動的時候，和華盛頓任第一任總統的時候，一班的國會議員却攻擊他非常激烈，這個從美國國會的會議紀錄中可以發見出來。爲甚麼當時受人攻擊如此之激烈，而百多年以後，却表現得如此偉大？這就是因爲近視病在作祟。在當時，因爲親近的關係，很容易被人發現短處。然而經過了長期時的延續，這些不相干的短處，便被人遺忘；而他偉大的功績，才能更有力的顯示出來。中國人現在之不能瞭解 總理，即由于這一「近視病」的原因。

其次便是完全運用唯物史觀來治歷史。唯物論者將歷史的變動，當作機械

一樣。例如美國史學家海士，便是如此主張着。他說：從事實上證明，如果將華盛頓、拿破崙、克里蒙梭、俾斯麥、林肯一齊從歷史上扯出來，而人類依然是有歷史存在。這種話雖然在他的看法以爲很有理由；然而，請問如果抹煞這班人對歷史創造的偉績，那末，人類的歷史中還有甚麼值得紀錄的價值？所以一個偉人和一個時代的重要性，是絕對不可磨滅的，僅僅憑物質和經濟是不能全部瞭解歷史的。列甯用馬克斯的方法來解釋歷史，他却忘記了：如果沒有他，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是不是能發生出的，是不是能夠成功？俄國的革命，一百條路當中，有九十九條是死路，而革命之能居然成功，便決不是僅僅一種歷史的必然演進的客觀事實，實在是由於革命幹部的健全，偉大的領袖之功績。因此，我們要認識 總理，必先除去上述的兩大毛病；同時不能僅從中國來看 總理，必須從世界來看 總理，才能充分的瞭解 總理的偉大。

現在，我們將 總理、列甯、甘地三個近代革命領袖的思想之重要部分，作一個比較。在他們三個人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兩個很共同的原則，雖然中國、俄國、印度的文化、環境都各有不同。第一，他們都能覓將近代的精神具體的表現出來。第二，他們都不是僅僅的看著世界的一角，而是以救整個的世界爲目的，他們的革命都是具有世界性的。

現在，接着我們將 總理、列甯、甘地三個人的主張之相異點與相同點，分別提示出來。首先說明列甯，其次再說到甘地，最後便提出 總理的主張來做一個比較。

列甯的第一個主張，是對蘇俄的建設，主張西歐化、近代化、機械化。本來，反對資本主義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根本認爲機械是罪惡，基督教徒的思想是這樣的。中國老子所謂「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一也」正同於這種思想。一種

是主張接受近代的物質文明，不過改變它的生產關係。列甯便是屬於後者，如想使全俄國達到電氣化、工業化之類。

列甯的第二個主張是革命必需絕對的使用暴力。他說：「利劍在手，不殺人必受天譴」。他又說：「按着政治計劃，合羣是不能廢用的。無論甚麼人，反對武裝的叛亂，和不肯爲叛亂而籌備的，我們都要無憐憫的把他逐去革命黨行列之外，驅逐他到仇敵的營裏，叫他和叛人或懦夫同在一處。因爲時期將至，到那個時候，強迫我們用這個方法分別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仇敵。我們切勿限制我們自己於毫無動作的地步，等候敵軍投到我們這邊來；我們必要大聲喊叫，必要手持軍器，大胆的攻擊。……」「攻打仇敵，我們必要盡可能的努力。羣衆的口號應該是『攻打』，不是『自衛』。……」從這些話的當中，我們便可以看出列甯對於用暴力的克服這一點上面，是如何注重。

列甯的第三個主張是以暴虐制暴虐。基於他這種倫理觀，他便是以成功爲道德。於是他們的行動，首先是爲目的不擇手段，結果便以手段當作了目的。同時他還主張說謊，他將世界分爲兩個部分，一個是敵人的，一個是自己。所以他認爲對敵人的世界去說謊，這種說謊便是道德。關於這些，我們最好還是找他自己的話來作詮釋。對於道德的觀念，他說：「凡是從超越自然的許多觀念，或從階級概念外的諸多觀念，而發生的全數道德，我們都不承認。自我們看來，道德是整個受制於階級戰的利益之下的，凡是要必用以剷除舊的牟利的社會組織，和用以聯合無產階級的，都是合乎道德的。所以我們的道德，只在乎謹嚴的紀律，和有意識的同牟利家奮鬥。我似不相信道德的諸多在外的原則，我們將發露這種欺騙。共產黨的道德，即是以鞏固勞工階級的狄克推多權力而奮鬥。」又說：「道德的概念，一經從模糊的道德語句，譯作平常日用的

語句，鮮作凡是有利於、有用於、便利於一個定羣的人民的，都是道德。凡是害於、不利於這一羣的，都是非道德。凡是一系統的倫理，無有不是根據於一定的社會諸階級的需要。凡是一個社會、一個階級或一羣所需要的，必常爲其所視爲合於道德。凡是有害的，必作爲無道德。「關於說謊，畢列巴拉森斯奇曾經這樣明白的說着：「凡在無產階級的社會中，說謊是一件無利益的事，因爲這樣一來，就要社會的諸多份子，努力揭露真情。但是在根據於階級制的社會裏，却不是這樣。當一個被剝削的階級與仇敵奮鬥的時候，說謊和欺騙，往往是很有用的利器。諸多革命的組織的全數陰謀密計，實在都依賴於欺騙國家的官吏。勞工們的國家，被仇視的資本國所包圍，見得在外交政策裏，說謊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用的。所以勞工階級和共產黨，對於公然承認說謊權利的態度，與西歐社會黨的態度，極其不同。這些社會黨是畏上帝的小市僧，常被

資本家的代表們所騙，被代表們作傻子看待……說謊原是個人壓制個人的後效，是階級羣戰的結果。」從這些文字當中，可以看得出列寧的倫理觀、道德觀的全部意義。在一個革命的鬭爭中，固然會不免獸性的發作，但如果將這些都當作教條來昭示同志，在我們看來，總覺得是不合理的。

列寧的第四個主張是反對資本主義。關於這一點，因為它的涵義很明顯，而且為大家所熟知，在這裏故不贅述。

現在，再來看看甘地的主張，甘地的主張，除了第四點——反對資本主義——和列寧相同以外，其餘的三點，恰恰和列寧站在正對立的地位。第一，他反對西歐化、近代化和機械的使用。第二，他反對用暴力，他主張戒殺、禁慾、吃素、唾面自乾的不抵抗。第三，他的倫理觀是宗教虔誠的倫理觀。

列寧和甘地，都同是近代的革命領袖，為甚麼兩人的見地和主張會相差如

此之壞？這原因就是因各個國家所處的環境與地位之不同。印度是英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是曼撒斯特原料的供給場，也是英國商品的銷貨場；除了以低廉的原料供給英國和滄納英國的商品以外，絕對沒有可能來建立他自己的民族工業。因此，他祇有走消極的路，勸導他們的人民不用英國貨。根本反對西歐化、機械化、工業化，以他們自己的小手工業來維持自己的需要。

其次，他之所以不主張用暴力，也是因為在英國強大武力的壓逼之下，沒有方法可以去反抗。過去中國歷史上所有的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的革命方式，那祇能運用在以前武器沒有大發明、沒有現在這般犀利的時代。印度的國家亡了，他們不容許再武裝起來，當然他們不能拿着拳頭去對付槍砲。所以甘地反對暴力，他是要用虔誠堅決的信心去打擊敵人的心，採取宗教式的感化方法。例如，以前印度的社會階級分別得非常嚴格，雖然國亡了，社會的階級和人的

身份還死死不放的保留着。甘地爲着要改革它，於是用絕食的方法去感動一般特權地位的人，結果，他終於獲得成功，取消了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他更進的要用這類方法去感動帝國主義者。英國近年來之對印度，在政治的許多事件上作可能的放棄，無疑的，這也是甘地努力的結果。

最後，讓我們來看看 總理的主張，就照上面述說列寧、甘地一樣，分作四點來作一個比較。

第一，關於近代化、機械化、工業化的要求， 總理和列寧是相同的。其所以會相同的原因，即由於俄國與中國的經濟情形相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雖然當時標榜着共產主義的立場，受着馬克斯的思想所支配；但是結果却顯然離開了馬克斯主義。馬克斯認爲：由於資本主義這一形態的發展，最後必然造成經濟制度的改變，即社會革命。而正統派的說法，也是認定俄國是不合

社會革命的條件。我們再看列甯和斯太林的政府，也祇是運用所謂五年計劃、再五年計劃去完成蘇聯的建設。這些都足以證明一九一七年的俄國情形，是不啻社會革命的條件。它會從資本主義沒有完全發達的經濟狀態下，發生出改造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的政策來，這豈不是和馬克斯的判斷完全不符？中國的情形和俄國一樣，當然不能產生社會革命，也不必一定需要透過資本主義之完全成熟期，才能達到社會主義之建設的任務。馬克斯之經濟學研討的對象，是以英國資本主義進展的形態作根據，所以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來切合一般的事實。因此，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儘管是以共產主義作中心，以社會革命相號召，而最後依然不能不另圖補救。不能說定要先成熟了資本主義，再來從事社會革命；即是要先去造成了病，再來想醫治的方法。總理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昭示同志，中國不需要社會革命，而是要在革命成功以後，來從事民

生主義的建設。不過，建設的計劃不能違反時代的精神，必須近代化、機械化。因為生產落後的國家，非先從事於生產的發展不可。

關於第二點，總理不僅是和列甯不同，而且也和甘地不同。這個當然也是由於各個環境的差異。總理不主張全用暴力，可是也不絕對反對暴力；不主張用宗教式的感化，可是不廢棄和平。總理的主張是：政治的改造，須用武力，因為需要驅除一切的障礙；經濟的改造，則運用和平。

關於第三點，總理和列甯、甘地也迥然不同。列甯主張以暴易暴；甘地則是一種宗教家的方式。總理的全部思想是以仁愛為出發點，許多人誤解以為這也是宗教的精神。固然宗教也包括仁愛，但是總理這種思想并不是出發于宗教，而是人類福利的意義。在這裏，我想以個人經歷的一個故事來作引證。

民國十三年，總理北上以前，正是容共時代，而本黨在改組以後，也正

在運用新組織的方法來改組黨部。當時，我正在担任市黨部的工作。有一次，忽然我感覺到在工作上發生一個困難，即是國民黨的工人與共產黨的工人，在民衆運動中發生領導權的鬭爭，使一個民衆的運動會發現兩種不同的意旨。共產黨運用黨團的作用來企圖支配全體，操縱全體，馴至兩方面的勢力相抵消，而終於無法推動民衆運動的工作。因此，我便跑去投訴 總理。其時恰好廖仲愷先生在座，我便指責廖先生，同時說，要請他去轉告共產黨和組織部長譚平山：如果 c. p. 份子在民衆運動當中，還要任意搗亂，破壞我們的工作，我便會要不擇手段的打倒他們，來開始這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鬭爭。

隨後，廖先生去了。總理便很和平的問我，第一句突如其來的話說：「你以爲革命的目的是爲着甚麼？」

「革命的目的是爲着救濟社會的罪惡。」我這樣回覆 總理。

「你說的不錯」總理接着說下去：「不過，你剛才說，要不擇手段去對付共產黨，那末這是不是罪惡？」

「……」我沒答覆。於是總理便同向我說了一篇很長的話，這些話是使我永不能忘的終身教訓。

總理說：「如果照你剛才所說，要使用不擇手段的方法去革命。那末，社會本來祇一層罪惡，經過了用罪惡去打倒罪惡之後，社會便成了兩重罪惡。接着再以罪惡來打倒罪惡，則不特罪惡之循環無已時；而且將使社會產生無數的罪惡。這個理由，許多人都不明白它的重要。試看歷史上的事實，每一個國家在改造的時候，必然經過一番大亂，這種大亂就是由於舊的之破壞。但是在舊的破壞當中，如果不擇手段的去幹，那末新的便無法建立起來。於是新的舊的都變成了罪惡，遂使革命成爲長期的混亂。官僚打倒之後，繼之以官僚；軍閥

打倒之後，繼之以軍閥。革命者如果不能從事於心理的建設，自己不久也將會變成了敵人。革命的情緒雖好，如果祇顧手段，不顧心理的建設，則這種人便是不相信他自己。我們既然有好主義、好計劃，便可運用正當的方法去做，何必一定非採用造罪惡的方法不可？篤信主義的人，不僅要認識主義，而且要有好的方法。」從這一段話裏面，我們可以看出 總理和列甯的分野來。

再有一個事實，也可以幫助我們來認識 總理和列甯的不同。當俄顧問鮑羅庭到廣州的時候，他和 總理談話，提出一個問題來問 總理。他說：「先生：你以為革命是為的愛人，還是為的恨人。」 總理的答覆是：「革命如果不是為的愛人，那末，就用不着革命。」鮑羅庭又說：「先生：如果像你一樣的慈悲心腸，革命是沒法成功的。」由這個對話之中，可以看出共產黨的思想體系，完全是所謂唯物的、階級的；如果階級不顯明，他們的革命便無從推

進。必定先要有仇恨，才能革命。馬克斯主義之如何，我們暫且不談，但是共產黨的革命方式，却是必然要先造出仇恨，然後再造革命的力量。在中國，勞資階級不顯著，於是中國共產黨便要從無階級的中國社會中，去造出階級來。例如海陸豐的初期共產黨暴動，使用屠殺焚燒的方法，抓住一部份人去對付一部份人，造成對立的形勢。參加革命的便是無產階級，反之，便是資產階級。這種屠殺焚燒的辦法，就是他們造無產階級的辦法。先將有飯吃的變成赤貧，然後便可以增加他們所謂無產階級的羣衆。這種方法是甚麼？即是中國小說水滸上所使用的：「逼上梁山」的方法。我記得從前在四川有一個李短辮子造反的故事，正和這種意味是相同的。

四川從前有一個盜匪首領，名叫「李短辮子」。當他準備造反的時候，首先他便要謀增加他自己的力量。有一天，正是鄉下人趕集的時候，他乘着這個

機會，便命令他的黨徒，把守着集鎮的兩頭，將所有的集上的人的辮子通通剪短，當作他的羣衆。等到官軍來清剿的時候，見着短辮子的便殺，以致引起官民間的重大惡感，沒有被剪辮子的也都很憤激的跑到李短辮子之下。於是愈殺愈多，後來幾至不可收拾。一直等到官軍方面改換了方法，聲明：凡棄械投降者免死，這樣才將那次的變亂平定下來。革命的方法如果不合理，則其結果必如李短辮子，而終歸失敗。中國共產黨過去的办法即是如此，所以也必然遭遇失敗，最後是回到本黨的領導之下來。

暴力，在革命的手段上，並非絕對不能使用，而且甚至是必要，但決不能不顧一切的使用。這是 總理與列甯最大的相異點。 總理主張在革命的過程中，暴力乃爲必要而使用；而在經濟上，絕對不能使用一個階級反對一個階級的作法，所以 總理主張用和平來改變經濟制度。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總理和列甯、甘地之不同，固然由於環境、文化等等之差異，而革命的出發點之不同，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至於第四點：反對資本主義，這是二個人都相同的。不過在這裏，我們又要更進的認識：反對資本主義的這一信念，雖然三人相同，而正因其各人之思想出發點不同，在方法上遂也有必然的差別。

俄國由第一次五年計劃之完成，進而至於第二次五年計劃之將要完成，這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這種成功的偉大，而且是空前的。即令在資本主義發達到極高度的國家裏，也不容易達到這種高度的成就。但是經濟建設的計劃儘管成就，可是俄國的革命問題，却始終沒有解決。這個，並不是由於他們的努力不毅，而是由於他們的思想出發點的錯誤。實在，俄國的政治目前全陷於一個極艱困的情形之中。在一九一四年到二七年之間，他們對於世界革命的口號，雖

然略略的表示退讓，但仍在修正進行。可是一到了一九二八年，俄國便完全放棄了世界革命，而入於外交的範疇。大家還以為俄國是以退為進，殊不知他已是沒有再一往直前的能力了。原因即由於內部的不協調。這個，從去年至今年層出不窮的反革命案件，便可以證明出來。二十餘年來的元老差不多都被趕盡殺絕。這樣大的一個矛盾的爆發，無疑的使國家會蒙受絕大損傷。而這種矛盾之造成，就是由於他們思想之出發點與革命手段使用上之錯誤。過去使用的某種手段，在對付敵人的時候，固然不錯；可是等到敵人去了，自己陣營裏便起了同樣的鬭爭。所以俄國的革命，雖然在物質上獲得了長足的進步，而他們的精神上却遭受了極大的損傷。對於俄國革命的批評，我以為與其說他們的努力不敷，無寧說他們的思想出發點錯誤。我們從歷史上看，每次大亂之後，必定需要一班講學者來樹立一個社會信仰的中心，然後亂後的人心才能安定下去。

否則，以亂止亂，打了敵人，再打自己，便沒有方法得到安甯。

依於前述之四點，我們可以看出 總理、列甯、甘地三個之不同點；而此種不同點之產生，一方面固由於各個環境、文化之差異，最大的因素，還是在思想的出發點上面。俄國革命之不能成功，即由於此；中國革命雖陷於停頓，但如能引為鑒戒，迎頭趕上，則成功是必可預期的。而且自 總理逝世之後，中國革命之所以陷於停頓，完全是因為思想上受了種種駁雜的影響，遂使三民主義的信徒走入歧路，這實在是至可痛心的事！我們應該知道：列甯和甘地固然偉大，但 總理的信徒却必要接受 總理的思想與方法；否則，不管你口裏如何表示你誠虔的信仰，事實上仍然不能作為一個 總理的信徒。既是一個 總理的信徒，其所言所行的一切，都必須要歸結到三民主義的道路上。由於中國共產黨最近的回頭，便證實了三民主義的偉大和其對中國的適合性，我們必

要正確的、努力的建立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來！

三、認識 總理的兩個要點

歸結上面所說的，我們對 總理的認識，我以為應有兩個重要的原則，是值得再提出來說一下的。

第一，我們要認識 總理，首先便應該瞭解 總理所處的時代。 總理誕生於鴉片戰爭後二十多年，那時正是中國從閉關自守變為與近代文化相接觸的時期。所以 總理的建設中國和改造世界的計劃，都是要使中國迎頭趕上近代的文明，而同時要使東西文化互相溶和起來。我們可以這樣說： 總理是站在東西文化中間而擔負起這個溶和的偉大歷史任務的人。

第二， 總理生長在中國這種產業落後的情形之中，同時受到歐美產業發

達的刺激，所以他的革命主張，便將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一同提出來，綜合起來作一次解決。他看到資本主義發達的危險，便希望使中國趕上資本主義的前頭，而免除社會革命的痛苦。這種見解與主張，是總理超越於列甯、甘地所獨創的地方。我們必須首先明白這兩個重要的原則，才能更深刻的

認識

總理。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日，桂林。